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题目：试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代青年交流
合作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姓名：_____ 赵丹彤 _____

学号：_____ 1501214957 _____

院系：_____ 新媒体研究院 _____

邮箱：_____ zhaodantong@126.com _____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试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代青年交流合作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赵丹彤¹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北京, 中国, 100871)

【摘要】放眼全球,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社会信息化深入演进,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旧不变, 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蓄势待发, 全球治理体系迎来深刻变革。顺应时代潮流,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使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力量得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助力于国际力量逐步趋向平衡。其中, 作为民族国家发展未来的青年群体, 就肩负起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本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青年群体应承担的时代重任, 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从青年主体对“一带一路”战略认知不足、国家大众媒体舆论引导缺位、社会化媒体作用受到忽视、社会民间力量未得到充分发挥四个方面揭示了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群体合作交流面临的困境, 并结合历史与现实, 从宏观与微观、外部环境与青年自身等多重视角, 分析探讨了有助于解决上述困境的可能路径与相应对策。

【关键词】 一带一路 青年 合作交流 困境 全球化

一、引言：全球治理与当代青年使命

当今世界,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新技术革命浪潮汹涌而来, 全球文明持续迸发出盎然生机。然而与此同时, 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平与发展、能源与环境、反全球化等全球性问题依然为全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 也对国家间开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跨领域、多层次、全方位深度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之上,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顺应了全球化发展的时代大潮, 再次展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性国际合作, 并与世界他国一道共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姿态。

¹ 作者简介: 赵丹彤, 女,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2015 级硕士, 手机: 18810519064, Email: zhaodantong@126.com.

在切实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得以有效实施的过程中，青年一代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理应努力成长为推动对外合作与时代进步的先锋力量，勇敢承担起解决全人类共同难题的历史使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架构下，以开阔的视野和宏远的胸怀，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互学互鉴，求同存异。

然而，语言不通、地域阻隔、文化偏见、意识形态差异、配套机制不成熟、交流内容与形式单一、缺乏多边与民间交流等局限都横亘在“带路国家”的青年之间，使得青年群体在“带路国家”交流合作中积极作用的发挥严重受限。为此，探索出一条适合“带路国家”间青年群体开展深度多元合作的有效路径，激发青年一代在区域性国际合作中的活力与能量，以此推动“带路国家”间睦邻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变得至关重要。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交流面临的主要困境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自提出后就引发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空间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共计约44亿人口，贯穿亚、非、欧三大洲，途经南海、印度洋、地中海等全球重要战略区域。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综合国力或社会发展模式，还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或风土人情，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客观差异的存在，再加上青年群体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使得“带路国家”间的青年交流与合作陷入诸多困境。

1. 青年群体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认知不足

首先，从政策层面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群体总体上对该战略构想缺乏了解和认知，没有形成独立系统的政治认同，从而也就导致政治参与上比较乏力。有学者统计，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于2013年提出，直至2015年上半年，海外已有相关中英文报道逾3500篇，出版中英文书籍数十余种；国内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报道也不计其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带路国家”的青年群体对该战略构想并不了解。以笔者身边同学为例，他们大都以新闻传播为专业，但即便如此，能完整表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名称的同学也在少数，更无论该战略的具体内容和意义。绝大多数同学表示，虽然经常在互联网、大众媒体还有课堂上听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但囿于其属于政治性内容比较枯燥，而且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等原因，便很少会去主动了解它的具体内容。由此，也就无法形成在政策认知基础上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不仅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和政策主体的心理回应，更是身体力行的行为表达。青年群体对“一带一路”战略缺乏认知，付诸于实际行动的政治参与动力便从源头上被削弱了。

其次，从国家层面来看，“带路国家”青年群体在各自国家认同理念的指引下，拥有不同程度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并且这种国家认同还会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干扰而有可能向偏激化方向发展。在这里，笔者从“归属感”的意义层面来讨论“认同”概念，认为“国家认同”就是社会个体或群体与国家本身之间产生了心理上和感情上的结合感，从而在潜意识中就将自己视为国家的一部分而行

动的现象。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符合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但也有部分国家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反应冷淡，并不认同该战略构想，如印度甚至对“一带一路”战略持质疑的消极态度，认为该战略不过只是我国主要为了谋求自身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利益而做出的新的战略发展布局，牵涉到的其他国家也不过只是其中的“棋子”和工具。类似这种在国家层面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判定与评价掺杂了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而青年群体在建构认知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而夹带个人情感偏好，导致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主动性受阻，同时也将使其认知内容和态度与客观事实产生偏差，从而对青年群体参与“带路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造成阻碍。

最后，从文化层面来看，具有强烈历史文化内涵的名词“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名称中的核心意象。从历史和地理视角出发，“丝绸之路”指的是历史上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间开展的友好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活动自汉代之后，渐渐变成在官方主导、甚至垄断下进行，贸易规模和范围也不断扩大，直至发展至鼎盛时期遍及欧亚大陆、北非和东非。可以说，虽然在“丝绸之路”这一体系下的贸易活动为其沿线各国都带来了实惠，但作为古代贸易代名词的“丝绸之路”仍然是古代中国国力强盛、辐射国际的直接体现。而今天当我们重提“丝绸之路”，其背后潜藏的上述意涵必然将对其他国家理解和接受“一带一路”战略带来压力。“带路国家”的青年群体也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上述历史文化意涵的误导，对“一带一路”政策产生误解，并进而对参与“带路国家”间的青年交流产生心理态度上的抗拒和行为表现上的消极被动。

2. 大众媒体报道中的刻板印象及其在舆论引导中的缺位与错位

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全球化发展潮流的推动极大地扩展了国家之间信息传播的平台与渠道。在国家的传统大众媒体上，青年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信息，这无疑将有益于“一带一路”战略在各国间的顺利实施。然而，正如学者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国家和本土新闻媒体的宰制地位确保了它们仍然可以阻碍全球政治的发展，同时宣扬一种对人间万象所采取的民族主义和本土的视角。国家电视上播报的国际新闻大部分是以国内的视角来选取，用国内的框架来解读的。”²不可否认，世界各国的主要媒体，在报道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不怀好意的臆测与判定，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日益强盛的国家实力和日益崛起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各国大众媒体报道中刻板印象的直接呈现。

目前的全球发展局势决定，不仅仅限于“一带一路”沿线，世界很多主要大国都与“一带一路”战略利益攸关。虽然没有哪个国家公开表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反对和抵制，但还是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大众媒体中瞥见些许端倪。美国媒体表示，“中国用两条丝绸之路还击华盛顿”，认为中国的目的不过是将中国与西方连接起来并确保能源供给安全。³日本媒体则认为，中国此举是在西面、西南以及南面扩张影响力。⁴其中，印度媒体的态度尤为值得关注，它甚至直接公开

² [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 媒体与权力[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³ 西蒙·丹佛. 中国用本国的两条丝绸之路绕过美国的“新丝绸之路”[N]. 环球时报转载。

⁴ 中国的西进战略[N]. 原文刊载于外交学者[日]. 人民网编译、摘录并转载。

传递了不愿意主动与中国寻求友好合作的态度,尽管这种消极姿态显然是来自于印度政府。传统大众媒体在传达国家意志上的影响力无远弗届,身处于此种舆论生态之中的“带路国家”青年显然无法超越此种意识形态的禁锢,进而对“一带一路”战略建立起正面积的认识与评价。

然而,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诸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持有质疑的消极态度这一客观事实,与此同时,我国主要大众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中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不仅在国内层面,在对外宣传中都存在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宣传力度不足、渠道单一、解读与传播方式单调死板、片面强调中国的大国责任从而导致宣传口径具有较强压迫性等明显弊病。上述关于大众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缺位与错位都严重影响了“带路国家”青年对“一带一路”战略建构起正确、积极的认识与理念,也就对其参与“带路国家”青年群体间的交流活动本身造成了严重阻碍。

3. 新兴社会化媒体的社会资源调动潜力未被充分激发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媒体在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互联网建设,这为“带路国家”之间通过互联网与新媒体进行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技术准备和支持。而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又带来了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式变革。“人”取代“传播媒介”成为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最核心要素和最关键节点。超时空、低门槛、信息海量传输、随时在线即时沟通等特点使得社会化媒体在调动社会资源上具有了先天优势,尤其是消除了对于国际交流来说最大的阻碍——地域阻隔。与此同时,青年是社会化媒体的主要用户群体,他们最具生机活力,最少保守思想,积极活跃在各类社会化媒体平台之上,创造内容,交流分享。因此,社会化媒体理应成为传播“一带一路”战略内涵和“带路国家”青年群体沟通交流的主要阵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社会化媒体在“一带一路”战略传播、信息交流共享与社会组织动员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造成了“带路国家”青年群体交流合作中的又一困境。笔者分析得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带路国家”青年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语言障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行语言多为英语,这就使得使用汉语的我国青年无法在网络空间中与外国青年群体自由交流;虽然可以通过语言学习削减这种交流障碍的消极影响,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带路国家”青年群体使用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未实现共融共通,交流联结渠道被切断;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在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群体中占据绝对优势,拥有最多数量的用户群;然而我国青年却很难获得接触这些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机会,更多活跃于本国范围内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之上;这种沟通渠道的断裂与分岔使得“带路国家”青年群体之间很难在互联网中进行互动交流与传播共享。第三,社会化媒体的强大作用并未引起“一带一路”战略宣传主体的足够重视;而这种传播战略布局上的“忽视”则直接导致了社会化媒体在具体战术执行上的“乏力”,进而掩盖了青年群体能够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原本应该具有的强大辐射力与带动力。

4. 未充分发挥社会民间力量，青年群体间交流形式与内容过于单调

“一带一路”不仅是宏观层面的国家发展战略布局，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绝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政府文件中的“路线与方针”，而是应该被积极落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然而目前，以我国为例，在推进“带路国家”间的友好合作时我们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模式，在这之下的青年交流也依然以国家、政府公权为主要力量手段，由此导致彼此交流过程中过于显性的“国家在场”，直接加剧了各方由于原本客观存在的实力地位差异而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压迫与被压迫感，也抑制了原本能够深入并长久地影响他国青年对我国的感性认知和认同的社会民间力量效应的发挥。笔者统计了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开展的海外短期交流项目，发现北大提供给在校学生的海外交流学习项目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项目屈指可数，而且内容形式也往往仅限于寒暑期学校等形式，而这些交流活动一般应对申请者的学习成绩、综合素养和家庭经济实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是说，能参与这些交流活动的同学只是极少数。

同时，政府主导的交流模式客观上将活动本身定位成了高层、精英路线，能够参与到政府计划的交流活动中来的青年大多都是在某领域的精英分子，这些少数群体对于更加简单、迅速、便捷和有效的社会民间性青年交流作用发挥的影响不够明显。笔者曾于2015年暑期，以活动主要筹备者的身份组织、参加了一个完全有北大学生自主发起的对日交流活动，此次活动筹备期长达一年。由于活动本身属于完全的“民间自发”属性，因此在组织筹备和进行期间遭遇了来自外部环境非常多的限制与阻挠。而在六年的发展历程中，该活动本身也是几经挑战，艰难维系至今。然而，尽管历经曲折，但这项交流活动的效果却非常显著，历届活动参与者都认为是其他“官方交流项目”所无法比拟的。可以看到，目前民间自发的青年跨国交流活动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充分调动社会民间力量开展青年交流的动力机制。这使得“带路国家”间的青年交流难以具备持久活力。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交流困境的解决路径与对策

1. 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在舆论宣传与引导中的积极影响

互联网能有效弥补以“国家主导”为主要传播模式的大众媒体在进行舆论宣传与引导中的不足。互联网通过削减“国家在场”的政治属性，减少国家公权在对外交流中或显性或隐性的强制力与压迫力，以一种更加软性的、柔和的方式实现信息和国家意志的交流和融通。同时，在“带路国家”之中，青年群体无疑都是本国互联网使用群体中的绝对主力，这就为互联网平台上的宣传主体提出了双重要求：不仅要传播适合互联网生态的内容，更要用青年人更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讲故事”。其实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丝绸之路”与其说是一种具象的地理空间表征，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文化符号。我国政府今天重

提“一带一路”战略，也是在文化层面上来对它进行解读和意义再挖掘的。和平、友谊、交往、繁荣是“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而“一带一路”则传递了发展、合作、和平、共赢等重要理念。通过在互联网上搭建青年论坛、聊天群、兴趣群组等方式聚拢青年群体，强调“一带一路”理念中的文化内涵，使各国青年群体建构起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正面、全方位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心理认同，达成积极主动的行为表现，以饱满热情和动力参与到“带路国家”青年群体间的合作与交流之中。

2. 充分挖掘社会化媒体在青年群体互联互通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化媒体在调动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天然地拥有巨大能量。较之以往的信息传播媒介，个体“人”在其中的自主性与主动性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发。而青年群体对社会化媒体的热衷又进一步强化了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中的显著地位。要掌握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的信息传播规律，尽力打通不同国家青年群体使用的主要交流共享平台，弱化语言差异带来的交流阻碍，选取具有高丰富度的媒介内容形式作为主要的信息交流传播介质，绑定能够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引爆高关注度、产生持久影响力的热点事件，弱化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群体的共情与共感，进而通过此种线上的感情共鸣引发线下关系联结的深度建立。在此过程中，“带路国家”也要同时注意加强对社会化媒体的共同监管，为该平台上的青年群体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交流生态。

3. 构建以社会民间力量为主导、多元参与的交流体系

具有持久活力与能量供给的对外交流往往仰仗于社会民间力量的多元参与。“带路国家”的青年群体间非官方的交流活动，由于规模相对较小，反而更容易营造轻松自由的交流氛围，更容易设计更为吸引青年的活动主题，也更容易实践新颖的交流方式。如此，活动中的青年群体也能实现更加深入的参与和卷入，获得更深刻的交流体验，并由此在彼此之间建立更为鲜活和生动的感情联结。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青年社团等民间群体的自组织作用，通过互派留学生，设立语言学习项目，举办学术、文化、体育类论坛或交流互访活动，动员社会民间各方力量多元参与，从高端精英阶层向所有青年群体延伸，共同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青年合作交流体系。同时，政府依旧要发挥积极的政策导向和引领作用，为“带路国家”青年搭建制度化的沟通交流平台，完善各方的利益协调机制，努力各国青年营造一个充满信任、理解、友善、包容的交流氛围与生态。

4. 大力激发青年群体的参与主动性与创造力

青年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最具活力与创造力的要素。“带路国家”之间未来关系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各国青年之间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往来。同时，青年群体在参与对外交流时，也是国家形象的最佳代言人与重要塑造者。在“一带一路”战略继续推进的过程中，作为国家民族发展未来的青年一代，首先就应当开阔视野，打开心扉，主动对话，以大格局、大视野、大胸怀去理解、尊重并包容差异；避免盲从与非理性行为，严格自律；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了解国情社情，时刻保持清醒，认清国际交流的复杂多面性、东西方文明的对立统一性和意识形态

的不可调和性；凭借自身的青春活力与亲和力，通过参与志愿者服务、文体交流等活动投入到全方位的青年互动中；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创造力与主体性，推动“带路国家”青年群体交流与合作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群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肩负民族国家发展未来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关系和平发展繁荣重大责任的青年来说，他们之间畅通无阻的交流与合作无疑是减少隔阂和误解，增进国家间的彼此认知和融合的不二之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与彼此关系的复杂性都昭示了青年群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必定无法一帆风顺，诸多障碍也确实横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群体之间。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所传递的“合作、交流、发展、分享、共赢”才是历史与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群体必将以此为新的使命，立足全局，把握当下，在新时代的发展节点上唱响属于青年人自己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 [1][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 媒体与权力[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 [2]艾明江. 两岸青年交流中的理论与实践思考[J]. 当代青年研究, 2012 (2).
- [3]蔡清辉. 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外语院校改革发展的机遇与风险探讨[J]. 经济界, 2015(4).
- [4]郝丽, 崔永刚. 网络政治参与对公民政治认同的影响和对策研究[J]. 新视野, 2014 (4).
- [5]李青青. 社交媒体中青年网民的信息互动与平衡机制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 2014.
- [6]李宇. 新媒体环境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模式研究[J]. 新闻知识, 2015 (7).
- [7]卢德平. 论中韩青年交流的形态及其支持系统[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 24(1).
- [8]石勇. 交互式冲突解决方法及其在两岸青年交流中的实践与启示[J]. 青年探索, 2014 (5).
- [9]孙存良, 李宁.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重大意义, 实践路径和建构机制[J]. 国际援助, 2015(2).
- [10]唐桦. 两岸青年交流的现状与路径建构——以政治社会化为视角[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
- [11]王志超. 网络空间中公民政治认同研究[D].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
- [12]杨久华. 试论我国青年外交的历史, 价值及其新世纪发展战略[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9(4).
- [13]叶琪.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环境冲突与矛盾化解[J]. 现代经济探讨, 2015 (5).
- [14]朱峰, 刘永萍. 新丝路 新友谊: 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之间青年交流新篇章[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09(10).